杭世骏及其《道古堂文集》

王 俊 义

杭世骏，字大宗，别字堇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虽算不上是第一流的学者和思想家，但无论是在政治或学术方面，都是一位有个性、有特点的人物，值得研究。可惜，其“没后，传状表墓之文阕如也”①。关于他的生平经历及其思想著述的史料记载甚少，《碑传集》及《清史稿》中都没有他的传记，在一些稗史、杂记中，有关他的轶事颇不少见，但多系传闻，有显见的疏误、笔者近来在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过程中，留意搜集阅读杭世骏的有关资料，草撰此稿，简要评介杭世骏的生平经历及其著述．并对以往传记资料中的讹误作些订正。

世骏死后二十余年，他生前交往的同里学者许宗彦写有《杭太史别传》。再后，洪亮吉撰有《书杭检讨遗事》，龚自珍也曾撰写了《杭大宗逸事状》。这就使杭世骏的事迹多少赖以流传。

民国初年，《清史稿》主要编纂者之一的夏孙桐撰写了《拟补清史文苑杭世骏传》。他解释了《清史稿》中杭世骏无传的原因：“国史旧传，世骏原入文苑，及修清史，缪艺风前辈辑文苑传初稿，因其与洪亮吉同以直言被谴，特将二人提出，与建言诸臣同列”，奈“载笔者未知此意，竟至阙漏”②。夏孙桐还对前述有关杭世骏的别传、遗事等文的可信程度，进行了评论，指出：“许宗彦与杭世骏乃世交故旧，语多有据”③，并说：“洪氏所记，虽皆遗事，尚有来历”，而“龚氏全出传闻，核以年月时事，种种牴牾，殆不足信”④。夏孙桐因参与编纂《清史稿》，并撰写了《拟补清史文苑杭世骏传》，涉猎鉴别了大量有关史料，其说有重要参考价值。

我们依据《杭太史别传》、《书杭检讨遗事》，并参照世骏个人著述一些序跋中的透露，大致可以钩稽出他的生平经历。

杭世骏生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卒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幼年时家贫力学，常借书于人，昼夜穷读，因父母劝阻“篝灯帐中默诵”。稍长，与同里一些年轻的朋友结读书社，“五日一相聚，互为主客问题，以多闻见者胜”⑤，世骏以其博闻强识，受到同辈推服。他于学无所不窥，读书范围很广，尤长于史，他曾在《诸史然疑》自序中说：“余年二十有五，始有志乎史学，贫无全史，且购且读，一日率尽一卷，人事膠扰，道涂奔走，酷寒盛暑未尝一日辍也。风雨闭户，深居无俚，则又倍之，阅五年而始毕功”⑥。由此可见，世骏的家境虽然不好，然却十分好学，史学根底尤深。雍正二年，世骏中举人，受聘为福建同考官。乾隆元年，应试博学鸿词，列一等第五，授翰林院编修，参与校勘《十三经》、《二十四史》，并纂修《三礼义疏》。

他“性伉爽，能面责人过”，如某先达以新著经说相质于世骏，他一览便曰：“某事见某书，某说见某集，拾唾何为学术”⑦，又如当时的著名学者，身居要职的方苞，颇以经学自负，常至编纂馆中，侃侃而谈，目中无人，每每自下己意。世骏则“微引经史大义，风发泉涌，与方苞为难，竟使苞无以对”。⑧

乾隆八年，因发生大旱，乾隆下诏“通达治体者”进谏，世骏被荐上时务策，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意见不可先设，畛域不可太分，满洲才贤虽多，较之汉人，仅十之三四。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何内满而外汉也？”⑨，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清朝统治，“内满而外汉”，诚然是事实，但清朝最高统治者一向标谤“满汉一体，并无歧视”。杭世骏此言，即刻引起刚愎自用的乾隆勃然大怒，斥责杭世骏“怀私妄奏”，“悖谬之甚”，实乃“微末无知之小臣”，“著交刑部严察议奏”⑩，经朝臣力保，世骏才免遭杀头之祸，终以溺职罪被罢职回乡。杭世骏所处的时代，适值康乾盛世之际，也是清代封建专制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时期，在绝对君权专制的形势下，多数文人、官吏，长于阿谀奉承，专意窥伺逢迎的气围中，世骏却敢于犯颜直谏，实在难能可贵。

杭世骏罢职归里后，曾先后主讲于广东粤秀书院、扬州安定书院，深孚海内重望，请益者常满坐。他于讲学之余，“即闭户著书，不预外事”，“最不喜读邸报”，这流露了他对清朝现实统治的某些不满。同时，他更不攀附权势，罢职后的二十多年期间，原与之在翰林院的同年，積官至大学士，或官至尚书、总督者，皆不乏其人。对此，杭世骏概不知、不闻、不问。乾隆三十三年，刘纶“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过扬州”，往访世骏，世骏“见其冠服，诧曰：‘汝今何官？’对方答曰：‘参预阁务者已数年’。世骏则谑之曰：‘汝后生小子耳，亦入阁办事耶！’”⑪又举说，学使钱文敏曾视学浙江，因其系词馆后进，至杭州亦往访世骏，时值盛暑，当日，世骏葛短衣，持焦扇，正与同里少年在门前望仙桥下嬉戏。杭钱二人在桥下邂逅相遇，钱说明拜访之意，杭即对钱说：“汝已见我耶！”钱曰：“正欲诣宅谒前辈耳！”杭则婉言谢绝“吾居舍甚隘，不足容从者”。⑫钱只好返归。对此，洪亮吉曾评论说：“视士大夫罢间后，日饰章服，出入官解，干预公事，并修饰与马仆者，以检讨（按：指世骏）视之，不尚胜焉”⑬。确然如是。

杭世骏罢职乡居期间，乾隆皇帝曾数次南巡，举说世骏有迎銮之事，最早记述此事的是汪涤源的《湛艺书屋杂记》：“乙酉，四举南巡，在籍文员迎驾湖上，上顾世骏问曰：‘汝性情改吗’？对曰：‘臣老矣，不能改也’。上曰：‘何以老而不死？’对白：‘臣尚要歌咏太平’，上哂之”。对于迎驾之事，龚自珍在《杭大宗逸事状》中亦云：“乙酉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召见，问汝何以为活，对曰：臣世骏买破铜烂铁，陈于地卖之，上大笑，手书‘买卖破铜烂铁’六大字赐之”⑭。龚自珍又谓：“癸巳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名上，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返舍，是夕卒”⑮。龚自珍所记杭世骏迎驾轶事，由汪涤源《杂记》引申演化而来。文笔虽尖酸泼辣，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戏谑揭露也十分深刻，然而却也未必符合史实。根据史实记载，乾隆六次南巡的时间分别是：乾隆十六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癸未岁亦即乾隆三十八年，然该岁并无南巡之举。再说，世骏在此前一年已经死去，又何以迎驾；同时，世骏之死，与乾隆南巡亦并无关联。联系到龚自珍在该文中，还将世骏之于乾隆八年上时务策，误记成“乾隆癸未岁（即二十八年）。说明龚在撰写《逸事状》时，并未严格查对史实，确存在“种种牴牾”，而“殆不足信”。但由于龚自珍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在杭世骏的正式传状又较为缺乏的情况下，其《逸事状》中记载的年月史事，则被许多人信以为真。如《清史列传》便据以说明世骏“卒于乾隆三十八年”；肖一山的《清代通史》，也根据龚自珍的说法，将杭世骏的上时务策，也以讹传讹的记成：“乾隆二十八年，诏举直言，……或以世骏荐”⑯。这些说法，显然都是受龚自珍《逸事状》的影响。

另外，据《国朝先正事略》与《清史列传》同样记载：世骏“后迎驾湖上，赐复原官”⑰。照这种说法，杭世骏迎驾后，不仅未被处死，而且被赐复原官。这种说法可能源自许宗彦之《杭太史别传》，然而《别传》的记载却是“归后，迎驾湖上，赐复原官，然太史既无传状，弗能详也”。《别传》最后又说世骏“沦落以终”。许宗彦之《杭太史别传》，写于世骏下世二十余年之后，时隔尚不太久，但其对“赐复原官”事，已“弗能详也”，显然是抱有怀疑态度，焉能据此作出“赐复原官”的肯定性记载呢？！再者，《清实录》中，有关乾隆六次南巡的记载，颇为详细，但对于世骏的迎驾与复官等事，却只字未提。联系到其它材料所说：“世骏没后，家鲜遗产，朋好弟子醵资雕其《道古堂文集》”⑱。杭世骏个人晚年在著述中也谓：“余为荒废颓落之人”⑲。说明，他从乾隆八年因上时务策被罢官后，始终不得志以终。所谓世骏“复原官事”，或系误传，或系对清朝封建统治的有意粉饰，尚待查考。

杭世骏在学术上，淹贯众流，以博洽著称。据说他“所藏书拥榻积几，不下数万卷，枕籍其中，目观手纂，几忘朝夕”⑳。他一生著述宏富，主要著作有《石经考异》、《礼例》、《续礼记集说》、《续方言》，《经史质疑》、《三国志补注》、《诸史然疑》、《汉书蒙拾》、《补晋书传赞》、《史记考异》、《汉书疏证》、《两浙经籍志》、《续经籍考》、《道古堂文集》等。晚年曾构建补史亭，欲专补金史，并成书百卷，惜未流传。

以上列著述目录即可窥见，杭世骏治学范围很广泛，成就表现在多方面。其《石经考异》一书，乃“因顾炎武之《石经考》，独有采摭未备，辩正未明者，乃为纠伪补阙，……其较顾炎武所考较为完密”㉑。杭世骏的好友厉鹗、全祖望均曾为该书作序，也都给予很高评价说：“山亭林顾氏芸有《石经考》一编，吾友杭君堇浦补顾氏之遗，中参以辩论，直落千古之濛滞，用思复精，不独为顾氏之净友，经学之功臣”㉒。《续方言》是杭世骏在训诂方面的重要著作，是书采《十三经注疏》、《说 文》、《释 名》诸书，补扬雄《方 言》之 遗，“搜罗古义，颇有裨于训诂”，虽有失检之处，“然大致引据典核，在近时小学家独最有根砥者也”㉓。清代训诂学发展极盛，《续方言》一类的著作甚多，诸如《续 方 言 补 正》、《续方言又补》、《续方言新校补》、《续方言疏证》、《方言别录》、《新方言》等，戴震又有同名作《续方言》，而杭世骏的《续方言》则是这类著述的首创之作，足见是书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影响。《礼例》则是杭世骏探求《礼》之通例性的著作，他认为“《礼》则非例不能贯也”，然“承学之士又病礼之繁富而不得门”，多不敢问津，他感到“《礼》无不归之例，而天下亦无难治之经”，因撰《礼例》“以为之阶梯”㉔，后来凌延堪又在该书基础上，编撰了《礼经释例》。其《续礼记集说》乃续卫湜之《礼记集说》，是书之作发端于其在三礼馆参与纂修《三礼义疏》时。此间，他从《永乐大典》中将“有关于三礼者悉皆录出”㉕，又吸收了历史上有关著述中的资料，“采集颇广”。其《三国志补注》，乃补裴松之《三国志注》之遗。不过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博采群书，考订精详，已为后世公认，世骏再作补注，“欲以博洽胜之”，难免陷入芜杂，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评，是书将“某人宅在某乡，某人墓在某里”，乃至“神怪妖异，如嵇康见鬼，诸葛亮祭风之类”，皆“累牍不休”。但其毕竟保存了一些资料，“以资考证，故书虽芜杂，而亦未可竟废焉”㉖。杭世骏的著述甚多，限于篇幅，本文对于其它著作，兹不一一评介。

除上述专门性的学术著作外，杭世骏尚有《道古堂文集》，这是研究其生平经历及学术思想的重要历史文献资料，也是清人文集中较有价值的一种。

《道古堂文集》最早刊于乾隆四十一年。复刊于乾隆五十五年，毕沅曾为之作序。这两种刊本，因年代久远，屡遭战火，版片多阙烂。光绪十四年汪唯曾复为补刊，成文集四十八卷、诗集二十六卷，并辑集外文一卷，后附世骏轶事，是《道古堂文集》最完备的刊本。《道古堂文集》收录了世骏大量序、记、书信、论说、题跋、传状、碑铭之作，内容丰富，颇能反映世骏治学之博洽。集中文字每言一事，皆循流溯源，穷究其终。如卷四《韩氏经说序》，论述说经之流派；卷五《施愚山年谱序》谈论年谱之体制；卷七《张岂堂金石契序》、《孙月峰书画跋序》，谈金石书画之著录；同卷《名医类案序》、《续名医类案序》，论方技医经之得失；卷二十一《答任武承问起居注》一、二、三、四数篇，详论起居注之义例，等等，皆辩证明晰。由于杭世骏更长于史学，文集中有关史学的论说，如卷二十三《志西汉盐铁》、《汉爵考》等文，比物类事，为数家珍，实开后来赵翼《二十二史箚记》之先河。另外集中的传状之作，辑录保存了不少清初学者的生平史实，如卷二十八的《阎若璩传》，卷三十八的《胡东樵先生墓志铭》，详细记述了阎若璩、胡渭的生平著述及学术上的成就贡献。后来，江藩作《汉学师承记》，其《阎若璩传》，几乎全文抄录世骏所作阎传。再如卷二十九、卷三十《梅文鼎传》上、下，更为详细地评述了梅文鼎的著述和论点，并附列了其友朋的状况，而后阮元所作《畴人传》即仿此体制㉗。

当然，《道古堂文集》中，亦有大量诗文序、寿序、墓志、碑铭等，纯属无实际内容的应酬之作，失之于滥，无甚意义。

综观杭世骏生平及其著述，已可见其在清代学术史上具有较重要的地位，毕沅曾在《道古堂文集》序中说：“梨洲、宁人振实学于前，而竹垞、西河继之，董浦先生其学之博而精，实足以继朱毛而追黄顾”。杭世骏生当黄宗羲、顾炎武及朱彝尊、毛奇龄之后，而处在惠栋、戴震、纪昀、钱大昕等乾嘉诸大师之前，清代学术由顾、黄而到惠、戴，中间实有一些过渡性的人物，杭世骏即属这类学者，他在清代学术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其学术内容虽不如后来专以汉学自命的学者那样严谨，其治学方法亦不如后来精密．然而其在经史考订、训诂名物等方面，与汉学家已较为接近，直接对稍后崛起的乾嘉学派发生了作用和影响。再就清代浙江学术的发展说来，杭世骏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浙江乃人文会萃之乡，学者辈出，源远流长。杭世骏作为一个浙江学者，其著作中有较多的篇幅和内容，反映了浙江学者的学术风貌，王咏曾在《蒲褐山房诗话》中记：“两浙文人，自黄梨洲先生后，全榭山庶常及先生而已”（按：先生乃指世骏）。当代学者张舜徽也认为：“浙学自黄宗羲、毛奇龄、朱彝尊、全祖望外。以言规模之大，吾必推世骏为巨擘焉”㉘。

不过，客观而论，杭世骏之学，显得博洽有余，而专精不足，缺乏极有价值的上乘之作。他也曾自我评价说：“吾经学不如崔东壁、史学不如全榭山，诗学不如厉樊榭”㉙，可谓自知之论。此外，杭世骏那种好直言、性豪岩的思想性格，对后来的思想家，如洪亮吉、龚自珍等也有直接影响。龚自珍以“同里后学谨状”的尊敬之情，写下的《杭大宗逸事状》，史实虽有疏误，却反映了他对杭世骏的爱慕怀念之情。

总起来看，杭世骏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仍不失是一位有特点的学者。

---

① 许宗彦《杭太使别传》《鉴止水斋文集》卷17。

②③④ 夏孙桐《拟补清史文苑杭世骏传》。

⑤⑰ 《清史列传》卷71，又《国朝先正事略》卷41。
⑥㉒ 杭世骏《杭氏七种》、《诸史然疑序》、《石经考异序》。
⑦⑧⑪⑫⑬ 洪亮吉《书杭检讨遗事》、《更生斋集》卷4。
⑨⑩ 《清高宗实录》卷182。
⑭⑮ 龚自珍《杭大宗逸事状》、《龚自珍全集》第161页。
⑯ 肖一山《清代通史》中册第604页。
⑱ 光绪五十五年刊本《道古堂文集》后附《轶事》。
⑲ 乾隆五十五年刊本《道古堂文集》卷36《侍读郑公行状》。
⑳㉙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41。
㉑㉓㉖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6《史部目录类》、卷40《经部小学类》一，卷45《史部正史类》一。
㉔㉕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4《礼例序》、《续礼记集说序》。
㉗㉘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5。

清太祖外戚阿古都督家族《谱单》与《谱书》试析

李凤民 李荣发

最近，我们在清朝“发祥地”新宾永陵某图姓人家发现一分努尔哈赤外祖父喜塔拉氏阿古都督家族的“谱单”及“谱书”。

阿古都督，前辈史家疑为建洲首领王杲。这一论点尽管鲜为后世所取，迄今亦未见它种解释。新宾出现的这一史料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并提出新的看法。

一、谱单与谱书的形制

新宾谱单，纸本，长 117 厘米，宽66.5厘米。从上面的折叠痕迹可知平时是折成17×12厘米大小的方块。已糟旧，折叠处大都断裂，有些地方有破损。写本，开头贴着明黄色纸签，上书满文（Sincala nala nakcn oncolo booiturgan）汉译是“喜塔拉氏舅舅之孙子家的谱”①。内录“昂文都里巴颜德”，以下包括阿古都督在内共十世谱系。其中，三世祖“都力绩”之左注有“兴祖直皇后之父”，五世祖阿古都督之左注有“显祖皇后之父”，六世祖“达格都督”、“多甘托钦都督”、“抓古都督”的名字之上并有“舅”字，其它人名间或用口语称谓、附加尊称、官职及品级等等。

与谱单同时发现的谱书，长 27 厘米、宽66.7厘米、厚0.7厘米，外敷紫红色绢质书衣，右贴书签，上书篆体《永陵喜塔腊氏谱书》名款，下印“本支百世”图章。书页无格栏、边栏及鱼尾，行格每半页最多七行，行二十二字，全书共页二十二。内有“光绪丁酉（二十三年）第十六辈孙熊岳兰翎防守御依惠”谱序、“太平沟老坟说”、“大东沟老坟说”以及十世祖图黑至十九世的谱系，最后有十七世孙恒孚及十八世孙宝春合撰的跋。此书成谱时间虽较晚，恰为“谱单”的印证及补充。

二、内容鉴别及其研究价值

（一）谱单载，“阿古都督，显祖宣皇后之父”。显祖为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明人称